

# 从怀疑到正视:本-古里安的中国观变迁与冷战时期的中以关系\*

余纲正

**内容提要** 以色列是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地区国家,但中以两国在冷战中却经历了积极接触、激烈对抗再到最终和解的复杂历程。作为现代以色列“国父”的大卫·本-古里安,从以色列建国至其去世前,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并可大致以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初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作为政府首脑的本-古里安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但其对新中国简单化和符号化的理解导致他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抱有相当怀疑的态度,其与西方阵营结盟的战略规划最终也加速了中以两国的分道扬镳。在下一阶段,本-古里安倾向于用更加长远的角度正视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新中国的崛起,并呼吁以色列社会以及西方世界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本-古里安对中国的分析研判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冷战时期以色列的对华政策,为理解曲折的中以关系以及复杂的全球冷战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本-古里安后期的中国观兼具哲学历史高度和现实政治维度,也为世界对中国的观察增添了一种独特的犹太-以色列视角。

**关键词** 本-古里安 中国观 中以关系 全球冷战 阿以冲突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冷战的铁幕在欧洲徐徐落下。与此同时,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也都经历着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动,最终见证了以色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相继诞生。尽管由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领导建立的以色列早在1950年就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然而由于逐步向全球扩展的冷战格局以及久拖不决的阿以冲突,中以两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没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甚至当1973年本-古里安去世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支

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还成为当时中国的中东政策中最鲜明的旗帜。

虽然全球冷战与地区矛盾给中以两国制造了一道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无论是从国家利益或是个人兴趣出发,作为现代以色列“国父”的本-古里安都关注着对很多人而言既遥远又神秘的红色中国。<sup>①</sup>本-古里安出生于沙俄治下的波兰,并在青年时代深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20岁时他动身前往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居住和劳动,并在英国占领当地后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在领导建立和建设以色列的过程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冷战时期的中国与阿以冲突研究”(项目号:19CSS037)的阶段性成果。

本-古里安展现了自身的务实和远见:他参与创建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并出任总书记,后来又成为以色列地工人党(Mapai)领袖和犹太代办处(The Jewish Agency)执委会主席。在二战中他采取了与英国人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成功地成为后来以色列国防军的创立、发展和壮大以及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本-古里安在建国后的头十五年担任总理期间所推行的各项内政外交政策,更是对以色列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sup>②</sup>

本-古里安在1948年以后的外交思想一直是以色列研究乃至中东研究学界里一个经久不衰的探讨热点。通过对众多以色列早期外交官的访问,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在其具有开拓意义的《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体系》(*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中指出,以色列对军援和经援的极度依赖、对来自苏联的敌意的认知,以及第三世界对以色列处境的冷漠,是影响本-古里安治下的以色列从建国初期“不结盟”立场逐渐倒向西方的三大关键因素。<sup>③</sup>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政府解密档案的研究,乌里·比亚勒(Uri Bialer)与雅科夫·巴-西曼-托夫(Yaacov Bar-Siman-Tov)等人对布雷彻的观点提出补充,认为在国际局势的现实考虑之外,本-古里安外交战略的转型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以色列地工人党内部的路线斗争以及该党为对抗实力强大的左派以色列统一工人党(Mapam)和以色列共产党的需要。<sup>④</sup>此外,什穆埃尔·桑德勒(Shmuel Sandler)从规范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一种“犹太外交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本-古里安在现实中的外交决策。<sup>⑤</sup>不过这种看法很快就被乔拉·戈德堡(Giora Goldberg)所修正,他通过对本-古里安的言行进行的进一步探究,发现在其眼中,“现代以色列国即是犹太思想的全部与实质(sum and substance)”,因此所谓的“犹太外交思想”本质上其实就是充满现实政治色彩的“以色列中心论”(Israelocentrism)。<sup>⑥</sup>

相较于学界对本-古里安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作用和地位的大量研究,本-古里安对中国的观察和认知并没有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国内外有关本-古里安的个人传记、中以关系史或中国与中东关系的著作,就算涉及这一方面,一般也

是只言片语简单带过。<sup>⑦</sup>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挖掘本-古里安在以色列建国之后的各种演讲、文章、通信、日记以及访谈,勾勒出其在与中国交往中的决策经过与自身思想的转变。本文将本-古里安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二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直到其去世。在第一个阶段,面对内忧外患,本-古里安尝试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以色列政府也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现实。然而,为了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受制于他对新中国简单化和符号化的理解,本-古里安最终选择与冷战中的西方阵营全面结盟,即使数次错失与中国建交的机会也在所不惜。到了第二个阶段,本-古里安选择逐步淡出高层决策圈,但始终以国会议员和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以色列政坛。这一时期的他倾向于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审视中华文明的特质以及中国的发展脉络。尽管本-古里安清楚地了解当时中国尚不发达的社会经济状态以及在阿以问题上坚决反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但其仍然从以色列未来发展与世界和平的角度鼓励以色列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多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和理解中国,并且极富远见地预测中国将会在未来几十年间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力量。

#### 从以色列建国到20世纪50年代末

作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处理中以关系的思路深受以色列自身局势与冷战大环境的影响,所以研究者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去讨论他在担任政府首脑期间对中国的态度。<sup>⑧</sup>在1948年建国之后的最初几年,以色列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在地区层面,新生的以色列国刚成立就陷入了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激战之中。尽管以色列在战场上获得了重要胜利,并在1949年成功逼迫所有对手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但下一轮阿以冲突何时到来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国民心头;在国内层面,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大量犹太移民的涌入,以色列处于严重缺乏粮食与外汇的困难境地。同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流的劳工运动(Labor Zionist Movement)与其他派别的不和由来已久,在这一困难时期,各个政党也因国家政策上的种种分歧而面临着随时爆发公开冲突的

危险。<sup>⑨</su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的以色列政府注意到了正处于剧变中的中国并开始尝试与之接触,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决滞留在上海的大量犹太难民。

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大批客居上海的犹太难民已经开始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各国,但在以色列建国时仍然有一万多名犹太人在上海居住。此时滞留上海的犹太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多来自俄国和中欧各国,且一心想前往巴勒斯坦地区。在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巴勒斯坦地区托管状态之前,这批难民由于相关禁令无法成行。但是,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他们终于有机会如愿以偿。

在以色列宣告独立建国后不久,为了加快犹太人离开上海难民营的速度,以色列的政府高层就开始思考与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不过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最高潮,到底应该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进行直接沟通,就成为一个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由于无论是从中国来到以色列的犹太人还是各大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当局的腐败无能,所以由中间偏左的工人党主导的以色列政府其实对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太大兴趣。<sup>⑩</sup>并且继1947年在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投票表决中弃权后,中国代表在1948年以色列寻求安理会推荐加入联合国时再度投下弃权票,导致以色列当年入联失败,此举更加深了包括总理本-古里安在内的以色列高层对国民政府的不满。<sup>⑪</sup>到了1948年下半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逐步占据上风,所以以色列政府更无兴趣给予国民政府外交承认。不过,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此时仍然被国民政府所控制,迫于形势,本-古里安和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还是在1948年底决定派遣时任以色列驻纽约总领馆的副领事摩西·尤瓦尔(Moshe Yuval)作为以色列移民部的代表前往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以色列驻沪代表处在尤瓦尔的领导下一共签发了7000份签证,并成功地使超过4000名上海犹太人前往以色列。而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为止,剩余7000多名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也陆续通过代表处

的协助分批抵达以色列。<sup>⑫</sup>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古里安与夏里特很快开始认真考虑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sup>⑬</sup>1950年1月9日,夏里特以外长身份向当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发去电报:“我很荣幸地通知阁下,以色列政府决定承认您的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权。”<sup>⑭</sup>周恩来很快复电表示“欢迎和感谢”。<sup>⑮</sup>就这样,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也是继缅甸和印度等国之后少数几个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的非苏联阵营国家。

然而,几个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很快就中断了中以这两个新生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朝鲜战争不仅仅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中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也直接导致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在本-古里安的主导下进行了首次重大转型,当然也就影响到了中以两国的双边关系。<sup>⑯</sup>以色列外交的这次转型并非一蹴而就:首先,除了部分左翼议员的反对,以色列国会以高票通过了支持联合国关于谴责朝鲜“侵略”并援助韩国决议的提案。通过国会辩论的记录可以看出,这次投票并不代表以色列各党派对于李承晚政权有任何特别的好感,而是此时以色列的大多数人真心期望联合国能在阻止各类战争方面扮演一些更有实质性的角色,尤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由联合国出面保护以色列免遭阿拉伯国家的下一轮“侵略”。<sup>⑰</sup>正是由于国会是以“支持联合国工作”为名通过的议案,以色列政府也为自己坚持从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的中立政策(non-identification policy)留下了回旋余地。<sup>⑱</sup>

不过,作为政府中“行动派”(Activists)的领袖,本-古里安不满足于仅仅用一份国会决议这样的表面文章作为以色列对联合国角色和工作的“支持”。他表示,这不足以显示出以色列对于制止各类“侵略”的坚定态度,而美国也将怀疑采取所谓“中立政策”的以色列实质上是在同情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本-古里安很快就向内阁提出了一项新动议,希望以色列派遣自己的武装力量去协助联合国军支援韩国。<sup>⑲</sup>以夏里特为首的政府“温和派”(Moderates)坚决反对这项提案,认为派军前往朝鲜半岛是军事冒险主义,哪怕只是象征性地出动部队,都会在以色列国防军内部造成严

重分裂,而且将进一步损害以色列与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最后,以色列内阁集体支持夏里特的意见,本-古里安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动议并自嘲“应该允许多数派犯一次错”。<sup>②①</sup>不过,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接对抗联合国军,美国在与朝鲜战争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也变得愈发强硬。即使是“温和派”也开始意识到,如果以色列继续坚持原先的中立政策,就很可能无法获得亟需的美国援助了。

1951年5月2日,本-古里安离开以色列开始对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在这场历时将近一个月的“非正式访问”中,本-古里安拜会了包括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马歇尔在内的诸多美国高层。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外明确表态,要求盟友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器禁运决议。于是,本-古里安再次向内阁强调,以色列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不仅将会决定以色列能否继续获得来自华盛顿的巨额财政与物资援助,还将影响美国在德国对以战争赔款以及叙利亚—以色列边境冲突等问题上的态度。<sup>②②</sup>在这样的局面下,本-古里安的务实考量终于压倒了“温和派”力图保持中立的理想主义。作为外长的夏里特等人不得不做出妥协,通知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改变投票策略,支持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决议。一些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在当时便指出,正是这个决定标志着以色列从实质上开始放弃了自身在冷战中的中立政策。中国和以色列之间通过驻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领馆所进行的官方沟通也陷入停滞,并且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都没有恢复。

到了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终于给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划上了一个休止符。不过这却没有改变中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遏制的状态,而以色列此时也依然在中东地区被阿拉伯世界所孤立。为了打开各自的外交局面,中国与以色列的外交往来重新被提上两国的议事日程,中以建交也迎来了又一次短暂的机遇。

1954年初,中以两国在缅甸开始恢复了接触。以色列驻缅大使大卫·哈科恩(David Hachen)回忆,中方在一次会面中建议让两国先尝试建立商贸往来,并询问以方有何种货物可供销售。以色列政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了欢迎,但也

在第一时间通知了美国政府,希望避免华盛顿当局的误解和愤怒。<sup>②③</sup>周恩来于1954年9月在人大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与此同时,中方在会谈中表明,只要以色列能更加积极主动一些,中国并不反对在商贸往来的基础上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政府也在原则上同意建交,并通过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所谓“贸易代表团”到北京向中国转达了相关意向。但是经过权衡之后,后续进程却被以色列方面搁置了下来。<sup>②④</sup>时至今日,关于以色列政府为何举棋不定依然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之一。包括哈科恩在内的部分外交官和比亚勒等学者都认为,临时接替本-古里安担任了一年政府总理的夏里特应该为这次错失与中国的建交机会负主要责任。<sup>②⑤</sup>也有中国学者指出,这时中国自身也萌生了寻求阿拉伯世界承认之意,因此对推进中以关系亦有一定顾虑。<sup>②⑥</sup>事实上,在上述原因之外,本-古里安及其支持者在台前幕后对以色列暂缓与中国建交一事发挥了很大作用。

虽然本-古里安在1954—1955年间名义上辞去了总理一职,但依然保留着国会议员的身份,并通过其支持者对以色列高层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了要应对与邻国的边境冲突以及阿拉伯游击队层出不穷的袭击,本-古里安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上。<sup>②⑦</sup>在外交上,本-古里安试图使以色列与西方阵营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两个成就,一个是说服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地区)分治决议,另一个是与(联邦)德国达成二战赔偿协定。”<sup>②⑧</sup>此时尽管朝鲜半岛已经停战,但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未消。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直接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周恩来握手,并于同年12月在华盛顿与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代表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贸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无疑会使本-古里安一直以来争取西方阵营支持的努力付之东流。这也是为什么夏里特政府与中国接触的举动多次遭到本-古里安的政治盟友、尤其是以色列驻美外交官强烈反对的原因。<sup>②⑨</sup>

在内政上,以色列共产党在不断谴责本国政

府尝试与西方结盟的同时,也在不断试图扩大自身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本-古里安开始忧虑,如果以色列政府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起密切联系,将加速共产主义在以色列国内的发展,甚至危及国内政局的稳定。以共总书记兼以色列国会议员什穆埃尔·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在集会中多次公开宣称,如果以色列不重返中立主义路线,那么“一场大灾难将在所难免。”<sup>②9</sup>而本-古里安也毫不示弱,他在国会辩论中回击,当所有以色列人都在关心着国家安全、移民接收与经济发展时,“也许只有(以色列)共产党人是个例外。”<sup>③0</sup>在本-古里安的眼中,以共只知道唯莫斯科马首是瞻,而与以色列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渐行渐远。因此,在这种意识形态纷争和剑拔弩张的政治形势下,对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过分示好,都会被以色列高层中的不少人视为对以色列内政和外交的双重威胁。在这样的压力下,夏里特不得不做出妥协,甚至在国会中公开表态否定自己主导的对华接触进程,并表示如果在目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外交关系,有可能相当于“将一把共产主义的利刃插入我们国家的核心”,尤其是当“我们正与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时。<sup>③1</sup>

随后,万隆会议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很快关闭了中以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机会大门。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见了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纳赛尔,并从后者那里看到了中国在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世界中打开外交局面的大好机会;次年,本-古里安则在巴黎近郊的色佛尔(Sèvres)秘密会见了英国和法国的政府高官,并商定将共同使用武力对付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对三国各自利益所造成的威胁。就这样,全球冷战阴影下的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中国和以色列面临着不尽相同的问题与挑战,两国领导人所做出的相应决策最终导致双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了对立。

在内政外交问题上的一系列根本性分歧,基本上扼杀了中以两国在短期内实现双边关系突破性进展的可能。不过,也正是从这时起,本-古里安开始展露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开始简单地引用中国俗语与历史典故来佐证自己的政治观点。在1956年的一场国会辩论中,反对党领袖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抨击执政党的施政方针,表示自己才是以色列人所喜欢的对象,并且“以色列人民全都站在我这一边”。本-古里安第一次尝试使用《论语》中的对话来回击政治对手,嘲笑和暗示贝京的心智和能力还不够资格去担任总理职务。<sup>③2</sup>

……中国古代的智者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应该被选出来领导人民呢?——是那些受所有人喜欢的人吗?智者认为这不一定。那么是那些被所有人厌恶的人吗?当然也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是那些好人喜欢但坏人厌恶的人啊!多么简单而高明的答案。<sup>③3</sup>

###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逝世

经过建国头十年的诸多危机和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局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首先在国防安全方面,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部署在西奈半岛的联合国紧急部队(The 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在充满敌意的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形成了一道有效的缓冲带,同时还保障了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进出红海的航行自由。其次在外交领域,承认以色列的联合国会员国数目稳步提升。尤其是随着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以色列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收获了超过两位数的邦交国。最后在国内方面,以色列工人党主导的执政联盟继续在国会占据稳定的多数席位。同时得益于德国的二战赔款与美国在工农业领域的投资,以色列经济也得以保持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年逾七旬的本-古里安开始考虑自己的退休与接班人问题。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十年,本-古里安所肩负的官方责任开始减少,并且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去阅读和写作,这让他能够更加充分和自由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因如此,本-古里安得以从更长远的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与现状,并相应地做出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和判断。

从1960年开始,本-古里安在他的演讲和写作中反复提及中国,其中第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中华文明为镜来对比和反思犹太教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历程。1960年初,美国布兰代斯大

学(Brandies University)决定授予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法律博士学位。在同年3月9日接受这一荣誉学位的仪式上,本-古里安发表了题为《科学、道德和先锋精神是当代文明三大支柱》的演讲。在讲话中,本-古里安把中国的孔子视为“先锋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并且借用《论语》中孔子的话来赞扬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拓奉献的精神。他说:

……在与耶利米先知同一时代的古代中国,有位名叫孔子的智者。尽管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但时至今日他依然是中国人的老师。他曾把拓荒者们的先锋精神浓缩进了一句非常简单但却深刻的话里。当被学生问到“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君子”时,孔子回答:“君子就是先去实践自己说出来的话,等真的做到了以后才让其他人追随自己的言论。”我们用了三代人的时间去改造我们的家园并建立起了以色列国。这些拓荒者们并没有把“重返锡安山”(Return of Zion)的口号挂在嘴边——而是动手实现了这个目标。<sup>③④</sup>

在布兰代斯大学的演讲结束后不久,本-古里安为1960—1961年度的以色列政府年鉴[*Israel Government Yearbook 5721 (1960/61)*]撰写了一篇题为《迈向新世界》的文章。<sup>⑤</sup>这一次他特别强调孔子作为“道德的象征”,堪比犹太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的希列(Hillel)——因为他们俩虽然年代不同,但都教育人们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sup>⑥</sup>

在这篇长达32页的文章中,本-古里安用了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中国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革命的漫长历史。除了概述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进程外,本-古里安还特意提到了好几位他认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比如“反对任何形式专制”的孔子、“在历史上首次统一中国并废除封建制度”的秦始皇、“尝试建立福利国家”的王安石以及“决心把中国从外国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将民主权利交到百姓手中”的孙中山。<sup>⑦</sup>从这些专门提到的中国历史人物及对他们的概括中,本-古里安也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许多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倾向。

总的来说,本-古里安很欣赏中国悠久的历史

史与丰富的文明,他在自己文章和演讲中多次提及中国历史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赞美中华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因为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海外,本-古里安的读者和听众主要还是以犹太人居多,而本-古里安最核心的目的也还是在于提醒他们犹太文明的价值所在。正因为如此,尽管本-古里安经常强调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的诸多相似之处,但有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两者拿来进行差异化比较。比如,本-古里安就认为,犹太人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不像古代的中国人或者“其他原始民族”一样对自己过往的历史有着无限的向往,因为犹太人知道传说中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所以犹太人“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未来和末日——因为他们相信到那时‘认识上帝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各国都会铸剑为犁,‘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sup>⑧</sup>本-古里安自豪地把这种“末世论”视为犹太人原创的“划时代理念”,并将它称之为“整个人类将获得救赎的第一缕曙光”。<sup>⑨</sup>

除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本-古里安对中国的新变化以及它在冷战和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也抱有极大兴趣。在很多同时代的以色列人眼中,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成了本-古里安最喜欢的话题之一。<sup>⑩</sup>美国著名记者和教育家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也表示,本-古里安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因为当勒纳对本-古里安进行采访时,他发现本-古里安不仅因为大量的阅读而对中国问题相当熟稔,而且当他们开始讨论中国的某个具体领域时,本-古里安还总是喜欢从椅子上跳起来向勒纳准确指出相关书籍在他书架上的位置。<sup>⑪</sup>

事实上,本-古里安在退休前后的许多不同场合都反复提到了新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变化,他甚至以中国青年的新面貌为例来鼓励以色列的年轻人更加奋发有为。在1963年以色列记者协会举办的一场午餐会上,本-古里安在发言时先是称赞了以色列的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们一样优秀与充满创造力”,突然话锋一转,表示“在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的年轻人能与你们相媲美”,这让在座的以色列各大主流报纸的主编们都惊讶不已。<sup>⑫</sup>

尽管本-古里安并没有像许多国家的“左翼

进步人士”那样在冷战时期受邀对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作为一位敏锐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通过大量阅读书刊、报纸和情报消息,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做出了一系列准确的判断和预测。比如早在1960年,当欧美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中苏之间的争吵只限于意识形态解读与宣传口号差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彻底分裂时,一直坚决抵制苏联通过操控包括以共在内的左翼政党干涉以色列内政的本-古里安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中苏两国的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共产主义的中国——尽管在形式上属于共产主义阵营,并且在名义上仍然和东欧国家一样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意识形态权威和某些政策——实际上更倾向于去开辟属于她自己的独立道路。就算她现在真的屈服于克林姆林宫之下,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状态也会持续减弱直至彻底消失。<sup>⑬</sup>

与之类似,在20世纪60年代初不少人还在怀疑新中国会不会和有没有能力自行研发核武器时,本-古里安就基于自己的判断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预测。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中,本-古里安十分肯定地表示中国将研发出包括核武器在内所有欧美目前拥有的高科技,并且“他们也毫无疑问能在将来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到那时,中国就将成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并且由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强国。”<sup>⑭</sup>尽管在当时很多以色列和西方人看来,这个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又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简直是痴人说梦。

这一时期,本-古里安对中国态度变迁的最后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反复鼓励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更加积极地看待和“接纳”中国。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受中苏分裂加剧、越南战争升级以及国内“左倾”思潮蔓延等影响,中国在外交政策上也变得愈发激进。林彪在1965年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在文中提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作为“世界的农村”,将包围和战胜北美和西欧这些“世界的城市”,并强调中国理应把支持亚非拉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sup>⑮</sup>在“文革”爆发后的最初几年,当时政策强调要团结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来同时反抗“苏联修正主义”

“美帝国主义”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傀儡和走狗”。这种思想相应地衍生出了新的中东地区政策,即在反对和打击美苏霸权主义的同时,还要证明一条可供替代的“新道路”的可行性与优越性。<sup>⑯</sup>基于这一政策,北京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宣称通过游击战术来进行“人民战争”的主张颇有好感,同时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后者还并未受到莫斯科的关注和重视。借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的东风,中国开始逐步高调介入阿以冲突,并将以色列和其所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视为自己在中东地区政治攻势中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sup>⑰</sup>

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本-古里安已经彻底辞去总理一职,但他仍在以色列政坛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甚至两次组建新政党来挑战自己曾经领导过的工人党在以色列政坛的霸主地位,虽然最后都没能成功。<sup>⑱</sup>不过,长期作为国家政治领袖的崇高威望,使其在以色列国内依然拥有不少拥护者,这也使得他在国会议员的竞选中屡战屡胜。在本-古里安看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显得如此“激进”和“愤怒”的核心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他相信,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决心一定要重返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然而,在现有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只能选择与阿拉伯人结盟,于是以色列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策略的牺牲品。<sup>⑲</sup>后来,本-古里安更进一步明确表示,由于中国在政治与物质上都给予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全力支持,对以色列而言中国已经成了比苏联更可怕的威胁;但当下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矛盾的起源“并不在于中国真的憎恨以色列,只是以色列的毁灭更符合中国的总体目标。”<sup>⑳</sup>

尽管中国和以色列在人口、面积和政治制度等各个层面都差异巨大,但本-古里安一直在思考以色列能做些什么。他表示,尽管中国在当前阶段非常敌视以色列,但是其真实的态度是被俄国人与美国人扭曲的。所以以色列“应该尽一切可能,哪怕是通过密使与中国保持接触,以期与这个未来的超级大国建立某种联系”。<sup>㉑</sup>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本-古里安的安排与运作,以色列著名的动物学家赫尔穆特·爱泼斯坦(Helmut Epstein)成功进入中国开展实地调研并传播家畜育种技术。<sup>㉒</sup>

由于“文革”的延续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相继到来,本-古里安在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努力和倡议并没能直接改善当时中国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敌视态度。因此,他认为或许美国可以凭借自身实力“帮助”中国进行改变,因为美国拥有以色列所不具备的许多条件。他在这期间曾多次提醒美国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处事方式主要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考量;中国与苏联之间争吵的实质并非关于马列主义的解读,而主要在于中俄两国历史上遗留的积怨。他认为“是俄国人而非美国人在历史上吞并了大量的中国领土”,所以苏联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因为这会让中国有能力夺回它失去的土地——本-古里安甚至多次揣测中苏在未来十年之内就可能为了这片土地大打出手。本-古里安认为美国人可以利用中苏之间的这一矛盾去和中国人达成某种协议,而“错失这个机会将意味着错过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sup>53</sup>在另外一个场合,本-古里安表示他乐见世界和平的到来,并认为实现世界和平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美国承认中国、接纳其进入联合国并帮助其进步”。<sup>54</sup>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的邀请,对北京、杭州和上海进行了访问。这次划时代的访问终结了中美两个国家长达二十多年相互隔绝的历史,也为冷战全球格局的演变揭开了新的一页。本-古里安对尼克松此行的成功感到十分欣慰。在同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尼克松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连任后,本-古里安向他发去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本-古里安说:“我知道你会以绝对优势当选(美国总统)。我也希望你在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将会是全人类团结的开始——正如我们(犹太人)的先知们所主张的那样。”<sup>55</sup>

尼克松很快就发来了回电,他指出像本-古里安先生一样有着远见卓识的人都会明白“打开中国的大门是我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尼克松表示他会在未来继续努力创造一个大同世界——“无论各个民族的哲学与政体差异有多大,所有人都能待彼此如亲朋”,并且坚信这是他和本-古里安共同的目标。<sup>56</sup>

在看到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交流的大门缓缓打开后不久,本-古里安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他一直都能够亲眼

一睹中国的现状。他向很多人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甚至当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邀请他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时,本-古里安不仅欣然接受,还特意强调自己更希望能“途径中国”前往。<sup>57</sup>1973年12月,本-古里安因脑溢血死于特拉维夫城郊的拉马特甘,始终都未能实现自己到访中国的夙愿。直到1992年,本-古里安曾经的仰慕者之一、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的大卫·利维(David Levy)终于在北京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sup>58</sup>

### 结 语

正如迈克尔·凯伦(Michael Keren)所指出,因为本-古里安一生都与政治联系紧密并且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无论是对他进行整体评价,或是专门研究他在某一时期的具体行为,学者们由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往往容易把自己代入“支持者”或“反对者”两派阵营之中。<sup>59</sup>此外,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本-古里安的问题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特别是在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转向推动下,最近几十年间,不少以色列和西方研究者对本-古里安的历史写作在很多时候渐渐演变成关于一些细节的反复辩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本-古里安关于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变迁这一鲜有人涉足的领域的讨论,一方面尝试尽可能填补这一重要人物在该部分历史研究中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为包括以色列史、亚洲和全球冷战史以及中国对外形象在内的多个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和思考。我们可以看到,本-古里安的中国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局限,尤其是一部分西方主流政界或学界观点的影响。但是,由于他自身独特的经历与追求,加上广泛的阅读和思索,本-古里安对于中国的历史理解和现状分析最终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犹太—以色列视角。

在许多以色列和西方历史学家的笔下,在惨烈的纳粹屠犹过后,本-古里安出人意料地带领他的犹太同胞成功应对了从以色列建国到发展壮大等一系列重大挑战,而这一点也因此被赋予了神秘主义的光环。由于其领导才能与长远规划能力,本-古里安甚至被不少人称为现代的世俗

“先知”。<sup>⑩</sup>在回首本-古里安对中国观察与认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时,本-古里安不仅展现出其作为政治家的精明实干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类似古代历史上“先知”一般的远见与睿智。当然,从本-古里安自身来说,他本人对“先知”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称谓并不十分上心,认为自己的许多判断只是因为对人类社会的各类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大量观察、阅读和思考。<sup>⑪</sup>事实上,本-古里安对中国的关注也可以放在他对人类多元经典文化的广泛兴趣中去考察。<sup>⑫</sup>为了更好地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荷马史诗》以及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原文,本-古里安曾在百忙之中抽空学习古希腊语和西班牙语。<sup>⑬</sup>根据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后来的回忆,本-古里安对他表示自己读过十六遍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且要求佩雷斯和他的年轻同僚们也都尽可能找时间读一读。<sup>⑭</sup>

本-古里安的“中国观”不尽完美:有时他也和很多人一样对中国的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分析、判断和预测——比如说他曾低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复杂程度,又高估了中苏两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然而,他对中国了解的广度与深度依旧让今天的人们感到惊讶。作为总理,本-古里安最关心的当然是如何保卫自己亲手建立的以色列并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为什么他如此迫切地希望与西方阵营结盟,而不是急于在20世纪50年代就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原因。但是,当他逐渐从为国家制定具体政策的琐事中脱身时,本-古里安便开始以更加长远的目光观察和理解正处于激荡和变化中的中国。他用中华文明来对比犹太文明的历史发展,从关心以色列未来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在冷战高潮期间奔走呼吁以色列国内及西方世界更积极地理解和看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并且乐观地向人们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远大图景。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领袖,意味着不仅要能够脚踏实地地处理每一天的各种棘手挑战,更要能够从历史的高度审视长远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古里安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展现出了哲学历史高度和现实政治维度这两者的融合。<sup>⑮</sup>

- ①在一些中文作品中,作为现代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有时也被称为以色列的“国父”。但实际上赫茨尔在希伯来语里被尊称为 Chozeh Ha Medinah,意为“国家的梦想家”或“国家的远见者”。相较之下,亲手将以色列国从理想变为现实的本-古里安则一般被世人公认为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例如 BBC News,“1973: Israel's Founding Father Dies”, On This Day 1950-2005,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december/1/newsid\\_2492000/2492775.stm](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december/1/newsid_2492000/2492775.stm), 2020-09-08。
- ②以色列地工人党(即现在以色列工党的前身)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主导着以色列的执政联盟。在本-古里安领导下,工人党推动了整套现代国家政治、法律与福利体系的建立。
- ③Michael Brecher,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 Setting, Images, Proce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561.
- ④Uri Bi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195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Yaacov Bar-Siman-Tov, “Ben-Gurion and Sharet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Great Power Constraints in Israeli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3 (1988), pp. 330-356.
- ⑤Shmuel Sandler, “Is There a Jewish Foreign Policy?” *Jew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0, No. 2 (1987), pp. 115-121.
- ⑥Giora Goldberg, “Ben-Gurion and Jewish Foreign Policy”,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1/2 (1991), pp. 91-101.
- ⑦少数几篇简单提及这一问题的文章包括 Binyamin Tjong-Alvares, “The Geography of Sino-Israeli Relations”,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Vol. 24, No. 3-4 (2012), pp. 96-121; 以及达洲:《戴维·本古里安与中国——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世界知识》1992年第4期。此外,以色列历史学家安尼塔·沙皮拉(Anita Shapira)在传记《本-古里安:现在以色列之父》中提到本-古里安“认为培养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极为重要,并且强烈批评了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但并没有给出这番言论明确的出处和时间。参见 Anita Shapira,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44.
- ⑧Michael Keren, “Bi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The Case of David Ben-Gurion”, *Biography*, Vol. 23, No. 2 (2000), p. 344.
- ⑨之前所提到的以色列地工人党即属于劳工运动,而其他派别则包括右翼的修正主义派(以自由党为首)、左翼的共产主义派(如以色列共产党)以及林林总总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和政党。

- ⑩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in Jonathan Goldstein, ed., *China and Israel, 1948 - 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pp. 13 - 14.
- ⑪按照当时联合国入会的规定,新申请国必须获得安理会中至少 7 票支持(1948 年安理会共有 11 个成员国,其中包括 5 个常任理事国),才能将申请案交由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由于中国、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弃权以及叙利亚的反对,以色列在 1948 年 12 月 17 日的安理会投票中最后只拿到了包括美苏在内的 5 票支持,因此无缘大会表决。
- ⑫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犹太人离沪》,上海宗教志, <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75195/node75205/node75326/node75334/userobject1ai92301.html>, 2020 - 09 - 03。
- ⑬有关以色列内部、尤其是其驻美大使馆与外交部亚洲司之间关于是否及何时承认新中国的争论,参见余纲正《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文件的解读》,《西亚非洲》2017 年第 3 期。
- ⑭Telegram: Moshe Sharett to Chou En Lai, January 9, 1950, State of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chives, Folder 41/150/A, in Jonathan Goldstein, ed., *China and Israel, 1948 - 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p. 16.
- ⑮*Collected Documents 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1957, II, pp. 22 - 23, in Jonathan Goldstein, ed., *China and Israel, 1948 - 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p. 16.
- ⑯Michael Brecher, *Israel, the Korean War, and China: Images, Decisions and Consequences*, Jerusalem: Jerusalem Academic Press, 1974, pp. 20 - 28.
- ⑰Protocol of the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se Committee meeting (meeting No. 43/2), 3 July, 1950. The Ben - Gurion Archives, in Young Sam Ma, "Israel's Role in the UN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4, No. 3 (2010), p. 81.
- ⑱当时的以色列领导人称呼自己国家的中立政策为“不认同政策”(non - identification policy),意为以色列不认同自己是美国或苏联任何一个阵营中的成员。这项政策源自联合国商议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时犹太人寻求美苏双方同时支持的一种折衷办法。
- ⑲⑳㉑Gabriel Sheffer, *Moshe Sharett: Biography of a Political Moder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549, p. 550, p. 586.
- ㉒Yitzhak Shichor, "The U. S. Role in Delaying Sino - Israeli Relations: Two's Company, Three's Crowd",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1/2 (2010), p. 16.
- ㉓Sabri Jiryis, "Secrets of State: An Analysis of the Diaries of Moshe Sharet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0, No. 1 (1980), p. 46.
- ㉔相关观点可以参见 Uri Bialer, "Top Hat, Tuxedo and Cannons: Israeli Foreign Policy from 1948 to 1956 as a Field of Study", *Israel Studies*, Vol. 7, No. 1 (2002), p. 27; "1954 Vote Cost Us China's Friendship", *The Jerusalem Post*, 21 August, 1963.
- ㉕夏莉萍:《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 20 世纪 50 年代中以接触始末》,《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 ㉖这个时期的阿拉伯人一般习惯将游击队称为“费达因”(Fedayeen),在阿拉伯语中指非正规的武装组织或敢死队。本-古里安在日记与讲话中也经常采取了这种叫法。参见“Statement to the Knesset by Prime Minister Ben - Gurion - 15 October 1956”,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istorical Documents,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MFADocuments/Yearbook1/Pages/27%20Statement%20to%20the%20Knesset%20by%20Prime%20Minister%20Ben-.aspx>, 2020 - 09 - 09。
- ㉗Abraham Rabinovich, "Goldmann: 'B - G Asked Me to Head Political Opposition'", *The Jerusalem Post*, 10 April, 1972.
- ㉘以驻美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为首的部分外交官们对以色列与中国的接触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严重的忧虑,尽管埃班个人的态度后来曾出现反复。参见 Cable 985, 93.01/2201/3, 7 January 1954, Documents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tate of Israel 1954, p. 92, in Yitzhak Shichor, "The U. S. Role in Delaying Sino - Israeli Relations: Two's Company, Three's Crowd", p. 15.
- ㉙M. Segal, "Communists Cheer Themselves", *The Jerusalem Post*, 20 December, 1957.
- ㉚B. Lea, "Knesset Talks of War", *The Jerusalem Post*, 21 October, 1956.
- ㉛10 August 1954, Israel State Archives, File 2414/3, in Uri Bialer, "Top Hat, Tuxedo and Cannons: Israeli Foreign Policy from 1948 to 1956 as a Field of Study", p. 27.
- ㉜北京此前曾激烈反对以色列接受德国赔款,因为其主张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可以用金钱和物资来赔偿。北京领导的自由党也因此一度获得了相当高的人气,并在 1955 年的国会选举中一举拿下 15 席,成为仅次于以色列地工人党之后的国会第二大党。
- ㉝B. Lea, "Knesset Talks of War". 本-古里安所引用的原文应该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厌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语出《论语·子路第二十四》。
- ㉞David Ben - Gurion, "B - G: Science, Ethics, Pioneering are the Three Pillars of our Civilization", *The Jerusalem Post*, 10 March, 1960. 本-古里安所引用的原文应该是“子贡问君

- 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语出《论语·为政第十三》。
- ⑤以色列政府年鉴采用的是希伯来历(犹太纪年)。希伯来历的5721年是从公元1960年9月22日到1961年9月10日。
- ⑥David Ben-Gurion, "Towards a New World", in *Like Stars and Dust: Essays from Israel's Government Year Book*, Sede-Boqer: The Ben-Gurion Research Center, 1997, p. 318. 希勒尔的原话大意是“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就是犹太律法的全部,剩下的都只是在解释和评论(这一点)”,语出《塔木德·安息日篇》第31节。
- ⑦⑧⑩⑬David Ben-Gurion, "Towards a New World", in *Like Stars and Dust: Essays from Israel's Government Year Book*, Sede-Boqer: The Ben-Gurion Research Center, 1997, pp. 318-319, pp. 22-23, pp. 316-317.
-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David Ben-Gurion, "Towards a New World", pp. 22-23. 这两段话的原文分别出自《圣经·以赛亚书》第11章第9节与第2章第4节。
- ⑳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B-G TURNS 86", *The Jerusalem Post*, 26 September, 1972.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Max Lerner, "Conversation with B-G", *The Jerusalem Post*, 26 June, 1963.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B-G: Press Ignores 'Great Things'", *The Jerusalem Post*, 1 Aug, 1963.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Anthony Alexander Loh, "The Hegemonic Moti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1949-1998", in Jonathan Goldstein, ed., *China and Israel, 1948-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p. 70.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Gangzheng She, "The Cold War and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63-1975",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22, No. 1 (2020), pp. 125-174.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本-古里安一直主张将以色列国会的选举制度由政党比例代表制改为选区代表制,这引起了他和许多工人党高层人士之间的严重分歧。而1954年“拉冯事件”(Lavon Affair)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再度发酵,最终导致了本-古里安辞去总理一职并离开工人党,先后创立了“以色列工人名单”(拉菲党)和“国家名单”两个政党,分别在1965年和1969年的国会大选中赢得了10席和4席,但都不足以撼动工人党在政坛的优势地位。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Y. Friedler, "B-G Believes Security Situation Deteriorating", *The Jerusalem Post*, 3 November, 1966.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China is Greater Menace than Soviets Says B-G", *The Jerusalem Post*, 21 February, 1971.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赫尔穆特·爱泼斯坦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他离开中国后在英国出版了《中国的家畜》(*Domestic Animals of China*),这是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家畜养殖历史和发展的百科全书。本-古里安后来公开承认20世纪60年代曾有以色列学者进入中国进行科研与指导工作,尽管他并没有公开点名爱泼斯坦。参见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Ben-Gurion Says Israeli Scientist Worked for Year in Communist China in 1963", 30 August, 1971, <http://www.jta.org/1971/08/30/archive/ben-gurion-says-israeli-scientist-worked-for-year-in-communist-china-in-1963>, 2020-09-09.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Ben-Gurion Sees Continued Friendship with Germany: Doubts 'Crisis' Reports", *The Jerusalem Post*, 14 February, 1965.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B-G Congratulates Nixon on Election", *The Jerusalem Post*, 16 November, 1972.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Nixon 'Appreciates' Ben-Gurion's Congratulations", *The Jerusalem Post*, 8 December, 1972.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B-G at Sde Boker Mahendra Meets", *The Jerusalem Post*, 11 September, 1963.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大卫·利维出生于摩洛哥,移民以色列后曾因为仰慕本-古里安而加入工人党。但是他所在地区的工人党负责人鄙视他的出生地,使他愤而转投贝京领导的加哈尔集团(由自由党发展而来,同时也是现在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前身),最后于1981年就任以色列副总理,1990年开始兼任外交部长,任内积极促成中以建交。参见 L. T. Hadar, "David Levy: Can He Win the Likud's Succession War?",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March, 1992, <http://www.wrmea.org/1992-march/to-tell-the-truth-david-levy-can-he-win-the-likud-s-succession-war.html>, 2020-08-16.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Michael Keren, "Bi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The Case of David Ben-Gurion", p. 347. 以色列的史学界为例,所谓“老历史学家”(old historians)大多支持中间偏左路线的劳工运动,所以对本-古里安保持着赞许有加的基本态度;而“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中的不少人在政治上更偏向激进左翼,所以他们对于本-古里安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他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忽视与打压以及其在外交军事上所表现出的“冒险主义”倾向,例如本-古里安在1956年制定与英法联手入侵埃及的决策。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这一点也体现在多本有关本-古里安的传记书名中,参见 Dan Kurzman, *Ben-Gurion: Prophet of Fi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The Armed Prophet*,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1968.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Anita Shapira,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44-245.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本-古里安个人对文化作品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在以色列建国后一些政府层面的相关举措中。例如在以色列面临经济危机的20世纪50年代初,本-古里安就批示必须从财政上保证从全世界搜集所有能找到的流散犹太人手稿文件,并用微缩胶卷影印保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内,因为他认为这对于犹太人的精神传承、国家构建与未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

要的长远作用。后来本-古里安把这一任务扩展为尽可能搜集其他文明的各类经典作品翻译为希伯来文并进行保存。

参见 Anita Shapira, *Ben - 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82 - 183.

③Tom Segev, *A State at Any Cost: The Life of David Ben - Gur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9, pp. 295 - 298; Shimon Peres and David Landau, *Ben - Gurion: A Political Life*, Berlin, Germany: Schocken, 2011, pp. 37 - 39.

④Shimon Peres and David Landau, *Ben - Gurion: A Political Life*, pp. 38 - 41.

作者简介:余纲正,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责任编辑:吴 明)

## From Suspicion to Understanding: Change of Ben-Gurion's Views on China and the Sino-Israeli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She Gangzheng*

**Abstract:** Israel wa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to diplomatically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but the Cold War era witnessed a complex process from contact to confrontation to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founding of Israel to his death, David Ben-Gurion,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also experienced a great change in his attitude toward and perception of China,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In the first period, while Ben-Gurion, as the head of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w China, his simp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RC led him to be quite skeptical in handling relations with Beijing. Moreover, his strategy of alliance with the West eventually accelerated the separation of China and Israel. In the second period, Ben-Gurion tended to ob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hina from a more long-term perspective, and called on both Israel and the Western world to view China'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from a more positive standpoint. Ben-Gurion's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China influenced Israel's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in several ways, which provides us with new possibilit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tortuous Sino-Israeli relations and the complex global Cold War.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nges in Ben-Gurion's views on China have both a philosophical-historical height as well as a political-practical dimension, and thus add a unique Jewish-Israeli perspective to the world's observations of China.

**Key words:** Ben-Gurion; Views on China; Sino-Israeli Relations; Global Cold War; Arab-Israeli Conflict